



## 经典作家之鲁迅专刊

## 鲁迅——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作家

□林 非

鲁迅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作家。

1925年6月16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刊登了鲁迅作品的第一位俄文翻译者王希礼给中国翻译家、鲁迅的亲密朋友曹靖华的信《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信中说他“从前在俄国大学所研究的中国文学,差不多都是古文,描写什么贵族的特殊阶级的生活,对于民众毫没有一点关系”;“读了以后,对于中国的国民生活及社会的心灵,还是一点不知道”“现在在中国的新作品里边,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以后”,“很佩服你们中国的这一位很大的真诚的‘国民作家’!他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他的取材——事实都很平常,都是从前的作家所不注意的,待到他描写出来,却十分的深刻生动,一个人物的个性都活跃在纸上了!他写得又非常诙谐,可是那般痛的热泪,已经在那纸的背后透过了来!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

这是鲁迅被称为“世界的作家”的起始!

最具权威性的还是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对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的称赞。1926年3月2日,《京报副刊》发表了柏生的《罗曼·罗兰评鲁迅》,透露了全飞由法国来信中关于罗曼·罗兰评鲁迅《阿Q正传》的一段话:“这是充满讽刺的一种写实的艺术。……阿Q的苦脸永远的留在记忆中。”

罗曼·罗兰是当时世界上健在的大作家中声名最为显赫的一位,他对《阿Q正传》作出这样高的评价,无疑充分证明鲁迅已经获得世界声誉。

鲁迅当时在美国也获得了声誉。1927年10月《当代》1卷1编刊载了石孚译自美国《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的文章,作家、记者贝尔莱特(P.M.Bartlett)的《新中国的理想领袖鲁迅》。文中说道:“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般人认他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中国短篇小说的开始,即在1918年他的《狂人日记》出版的时候。”“最著名的《阿Q正传》已经译成了法、俄、英、德四国文字。”法国文学大家罗兰氏予以高度评价:“鲁迅用写实方法描写一个农民——阿Q——的思想,把阿Q那种无知的情景,绘得淋漓尽致。阿Q不识革命为何物,不解新时代的意义,这都历历说了出来。在《风波》里,他描写乡村生活,并且用滑稽和讽刺笔调,叙述农民怎样不受社会改革的影响。《狂人日记》是一个对于旧文化的讽刺作品。……他是一个天生的急进派,一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话写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

这一系列国际权威性的评论,足以证明:鲁迅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公认的“世界的作家”。正因为如此,1929年曾有人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被鲁迅谦虚地婉谢了。

尽管这样,鲁迅的作品依然坚挺地向世界文坛走去,日益获得崇高的声誉,并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经典。日本自竹内好起始历经丸山升、伊藤虎丸等鲁迅研究专家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可观

的日本鲁迅学史。前苏联、欧美等国的汉学界也都把鲁迅著作当成必备的教材,出现了数量和质量都很壮观的研究著。在世界上取得如此地位的中国现代作家可以肯定地说只有鲁迅一人。

鲁迅之所以能够第一个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唯一一个经典性中国现代作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本身具有无可质疑的经典性——思想深刻,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其作品开创了典范的现代白话和现代文体,也广泛地汲取了世界文学的最先进的、最为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技巧和新的思想,从而深入地揭示了人类的普遍弱点,引起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共鸣和警觉。走向世界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自身作品的质量。真正好的作品,不会因不虞之誉而增一分,也不会因求全之毁而减一厘。“打铁还得本身硬”,任何外在的吹捧与宣传都不会起到长远的作用。归根结底,好作品是靠作家自身过硬的创作能力而锻造出来的。

中国的鲁迅研究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学术史,虽然走不少弯路,但终究有着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对鲁迅著作和鲁迅史实行了反复不断的分析与阐释,使得研究者与读者更易于走进鲁迅的世界。这不能不说鲁迅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经典的另一个原因。

所有这些都给今后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

## 海外知识分子接受鲁迅影响的类型

——以韩国为例

□[韩]朴宰雨

“世界各地接受鲁迅”因全球各国的时代环境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知识分子因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立场的不同,在接受过程中会呈现相当复杂的情况。考察韩国知识分子接受鲁迅的不同类型,或许能为“世界各地接受鲁迅”的研究提供一个典范的例子。

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4月发表,并于1927年8月首次被韩国人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登载在韩国《东光》杂志上,由流亡中国的韩国人柳树人翻译。之后,鲁迅的各种作品不断被外译出版,此后相继传播于韩、日、英等东西方各种语言世界。如今,在世界各地,稍有人文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位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人物,不可胜数的人都受到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

世界各地接受鲁迅的知识分子类型不同,其影响力也多彩多样。以韩国为例,近100年来,韩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受到过鲁迅的影响。考察1920—1945年的日本统治时期(第一时期)、1945—1997年的军政及独裁统治时期(第二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民主化时期(第三时期),韩国接受鲁迅影响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思想家型、作家型、学者型和一般读者型。

“思想家”型又可分实践性思想家型、自由思想家型、行动上变节而心态上保持鲁迅情怀型。

“实践性思想家型”基本是指接受鲁迅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粹,正面接受鲁迅、崇拜鲁迅、拥抱鲁迅,从鲁迅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在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下,立足现实土壤,积极进行实践的变革指向性知识分子。

其代表人物有第一时期的李明善(1914—1950)

和第二时期的李泳禧(1929—2010)。第一时期(日帝时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鲁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鲁迅研究》。在他眼里,鲁迅后来成了一位通过杂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怀的文学家。他后来站在北部的立场参加南北战争而牺牲。第二时期的李泳禧是众所周知的“韩国的鲁迅”,他从1950年代末开始偷偷接触鲁迅,视鲁迅为其社会实践的导师来学习,终于成为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对韩国民主化的贡献是很大的。

自从1926年敬隐渔将《阿Q正传》的法译本呈给诺贝尔奖得主罗曼·罗兰,而罗曼·罗兰称赞这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后,鲁迅的研究就开始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并且逐渐成为海外汉学中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关注度最高、成就也最为丰硕的论题。但是,对于鲁迅精神的意义与价值,海外汉学的评价却见仁见智,有的时候甚至相差甚远。几

“自由思想家型”基本是指那些虽崇拜鲁迅,但从自己的需要和角度出发去接受鲁迅,或者用自己的一套思想来重新阐释鲁迅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大多归于“永远的批判者”、“永远的怀疑者”和“永远的自由人”之类。

其代表人物有岭南大学法律学院的朴洪奎(1952—)教授等。朴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鲁迅》一书中解释“我喜欢鲁迅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批判性自由人,再没有像鲁迅那样彻底的人物”;“我不赞同把鲁迅当做民族主义者”;“鲁迅对反权力、反奴隶的呐喊,不仅在中国有效,同样,在韩国也有其说服力”。

“行动上变节而心态上保持鲁迅情怀型”,是指那些当初崇拜革命家鲁迅或左翼鲁迅,积极支持或亲身参加各自反法西斯斗争或革命运动,后因受独裁权力的各种弹压与怀柔政策而转向的人。他们虽然在社会实践上有所转向,但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些许鲁迅情怀。

这种类型的文人,在日本知识分子占多。在韩国则以第一时期的张赫宙和第二时期的李炳注为代表。张赫宙很尊重鲁迅,鲁迅去世后,他还在日本著文哀悼鲁迅,但1930年代末期他开始逐渐变节转向。李炳注(1921—1992)在1941年底第一次读到日语文库版的《鲁迅选集》,深感“鲁迅是一道不会在任何暴风雨前熄灭的‘光明’”。这段话见于麟麟苑1983年出版的《自我与世界的遭遇—李炳注告白录》“鲁迅”章节。虽然他后来受到军事独裁的压迫而转向,但还是在此书中选录“鲁迅”一篇来表达怀念之情。

“作家型”的知识分子里,有正面接受鲁迅文学并指导自己创作的作家。他们从鲁迅文学里学到其文学思想与创作精华,活用鲁迅作品的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以鲁迅为参照系指导自己的创作。其代表人物有韩雪野、金史良、刘阳善和朴景利等。

第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左翼作家韩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接受鲁迅的影响。日帝时期他写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影响。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说《天马》和《Q伯爵》,也都受到鲁迅的正面影响。刘阳善(1952—)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完全模仿

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朴景利的《给Q氏》则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

“作家型”的知识分子里,还有一些在创作志趣与文学立场上与鲁迅不同的作家,尽管他们自称受到鲁迅的影响,但多误读鲁迅,或批判鲁迅的界限。这其中以第一时期的李光洙(1892—1950)最为典型。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达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载于《朝鲜日报》的《对战争时期的作家态度》一文中,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他以日文发表的短篇小说《万翁之死》,以打杂的万翁为主人公,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但在创作旨趣上却和鲁迅不同。

“学者型”的研究者中,有相当一些中文专业学者或能读懂中文的知识分子,他们认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从中切实觉悟到知识分子的使命。这类知识分子曾长期经受军事独裁统治,大都支持民主变革运动,有些人甚至还因直接参与而坐牢。他们研究并推广鲁迅,将鲁迅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站在民间立场参与社会抵抗运动。民主变革运动基本成功后,他们大都回归原来的行业,不少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骨干教师,继续在价值指向上升取鲁迅精神的养料。

此外,还有另一些纯粹研究鲁迅的学者,他们并不把鲁迅与自身所处的现实挂起钩来,只是站在学院派的立场去研究鲁迅。在这些学者中,也不乏一些口头上肯定鲁迅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内心却否定鲁迅现实意义的“口是心非”的学者。

“一般读者型”包括“从鲁迅作品中正面吸收精神营养”的读者和只为增加知识而读鲁迅作品的读者。后者体会不到鲁迅的价值与意义,而前者却因认识到鲁迅作品的价值而衷喜欢鲁迅,或把鲁迅作品当作自己所推崇的世界经典,这类读者的不断产生正是鲁迅作品在韩国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

韩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鲁迅的影响。考察韩国知识分子受鲁迅影响的不同类型,可以说,其一方面反映了鲁迅与韩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世界各地接受鲁迅”的范例。

(作者为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成为鲁迅乃是他始终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他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与文化符号的意义主要是在这一现实层面展开与延伸。所以鲁迅的意义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他的价值不仅是历史的、传统的,而且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的。而鲁迅的世界性意义也就在于他为世界提供了一扇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精神窗口。在这扇窗口,可以充分地看到中国现代社会改革的历史要求、民族想象,同时也可充分地体验到中国现代社会改革的艰难险阻。正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代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一样,鲁迅的全部创作也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革进程的百科全书。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左倾思潮影响下鲁迅研究的机械政治化倾向,鲁迅研究界曾经发出鲁迅研究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响亮口号,现在30年时间已经过去,鲁迅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当鲁迅的世界性意义在鲁迅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越来越被缩减为文学家的历史时空,我们是否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活去”的口号,让鲁迅精神和鲁迅研究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层介入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世界性资源呢?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一开始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改革,而是具有一种广泛的世界联系中的改革。鲁迅的世界性意义的探讨在国家文化海外交流与传播事务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的时候。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鲁迅是少数几个具有多方面、多领域影响力的历史巨人。他集思想家、文学家、文化批评家、学者于一身,在他涉足过的各个领域内都做出了杰出的建树。但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则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文学家或者纯粹的学者,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有风花雪夜,有闲情逸致,有孺子情怀,但鲁迅之所以

最近偶然翻阅鲁迅的《复仇(其二)》,其中写的是根据圣经《新约》里《马可福音》记载描述的耶稣之死的情景。一开卷,我就被鲁迅的文笔牢牢吸引住了,这篇极短的速写,总共还不到500字,可是,任谁的目光一旦扫视到它,你都无法从这篇文字上移开。其中情景的惨烈、文字的警策,不能不让人心震撼。

于是翻出《圣经》来对照阅读。在《新约·马可福音》第15章,有鲁迅所描述故事的原始记载。对照之下,鲁迅的描述内容当然是如实的,但是,两者的文笔就简直是天壤之别了。《圣经》原文质直、朴素、平实、清晰,相比之下,鲁迅的文字大为升华,无论对内容的选取、对周围氛围的描写,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入木三分的评说,都远非原文可比。经鲁迅的描写,人物的心理被刻画得丝丝入扣,尤其是对耶稣的感受。更令人震撼的是对整个过程的描述,比原文简略,却比原文生动得多。看原文,只是知道一个故事梗概,而读鲁迅的文字,就会被深度震撼、强烈感染,甚至有一种惨痛感,还会引起你久久的思索。从中可以看到,鲁迅对原文的理解、对故事的选择、对内容的剪裁,所发的感叹,都令人叫绝而且震悚。虽然那“原文”只不过反映了中文翻译者的文字能力,并非英文,但显然是忠于英文的。而更重要的是,从中可见到鲁迅对世界文化的理解,对西方文化中的尽人皆知的经典故事,敢于作如此重新描绘、解读的勇气。

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的意识中,有一种“世界人”意识,即习惯于从全人类的视角看问题,对西方文化毫无隔膜之感。其实,鲁迅从早年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人”概念,就像现在很多在世界各地穿梭行走的人们一样,看到人类的全球化、一体化大潮,而在当时,却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因此,当鲁迅提出“不读中国书”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至今也不理解,其实,这是因为鲁迅的意识太超前。时至今日,在读中国书(尤其是那种当时的“中国书”即古书)的人已经少而又少,虽然推广也少有成效。但是对于当时缺乏对中国古书中的毒素抵抗力量的青少年来说,毋宁如此。

推而广之,鲁迅在一生的文化活动中,处处以“世界人”概念来因应世事。他看人,说:“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他忧中国人的命运,担心将要被从“世界人”中“挤出”;他呼唤中国人要发出“觉醒的人的真声音”;他翻译作品从全球视角选取作品;他生活中接触的世界各国的文化界人士涉及日、美、苏、英、法、德、韩、新西兰、捷克、奥地利等十余国;他在著述中论及的外国文学作者达166人,他所记载和提及的外国作家达27国共计571人。

正因为鲁迅的“世界人”理念,他的思想和作品也就更易为世界所接受,因而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为各国所关注,在各国传播得很远。早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他的文化活动就引起关注,回国后他始终与外籍人士、外国文化界有联系,越到后来越广泛。1926年瑞典已有人建议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为鲁迅所婉拒。同年他的《阿Q正传》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到1931年,该书已经有了英、法、日、世界语等语种出版。1933年他被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工人大会选举为主席团名誉主席之一。1936年鲁迅进入国际人士编辑的《名人录》,他逝世时,已有外籍人士提出建立鲁迅图书馆、博物馆、雕塑等建议,1937年由日本首先出版7卷本《大鲁迅全集》,这都表明鲁迅已被国际人士视为当代世界文化界重镇。从那时以来,鲁迅著作又被广泛传播,到上世纪80年代,鲁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50多国的70多种文字,在2000年前后中外文化界开展的各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性排名时,鲁迅的《阿Q正传》基本上在所有的相关榜单上都名列第一。

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国外文化界判断中国文化的值据当然并非党派或领袖的大力推举,而是出于对作品的阅读和判断。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说鲁迅是他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法国人有人说鲁迅是“通往中国的最短途径”,日本一些作家说:“日本在战后的处境,正如战前的中国,而日本国民的屈辱感,从鲁迅那里找到了共鸣”,因此鲁迅就被尊为精神偶像。而韩国人说:“鲁迅在韩国已经普通名词化了。”

他们为什么对鲁迅如此看重?他们最推崇的是鲁迅的什么?只要我们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人们更注意的,其实是鲁迅的人格意义,无论他们怎样评价鲁迅的作品,他们对鲁迅最推崇的,其实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自主意识、独立人格的人的特质。因而,韩国会出现“韩国鲁迅”,中国台湾地区则出现了不止一个“台湾鲁迅”。而在日本,又因研究鲁迅的独特见地和视角而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不难看出,人们是把鲁迅放在一个“人”的坐标上来观察的,无论作出何种解读,最终的归结,都落到一个“人”字上,而且是作为一个“世界人”来解读。西方的人们对鲁迅的关注与研究,多侧重于作品的解读、意义的分析、艺术的欣赏、学术的论证,更多出于借鉴与吸收,以尊重为前提,这也正是国际交流的常态。所谓法国人不骂巴尔扎克,俄国人都不骂托尔斯泰,所在皆是,偶有因政治背景而毁誉参半者,也仅是“参半”,不能全予否认。但即使仅仅讨论鲁迅作品,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鲁迅本人,总体上,从国际文化学术界的普遍反映来看,谈及鲁迅者除非怀有偏见,一般都会对鲁迅的人格表示敬佩与尊重。

因此,鲁迅的最高意义就在于他的人格意义。鲁迅的价值就在于教我们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世界人”。

(作者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

## 本土经验与批判精神

——关于鲁迅精神世界意义的思考

□谭桂林

年前我曾主持一个学术讲座,讲者是国内一位精通中西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就认为鲁迅的一些社会文明批判的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难以得到西方人的认同,譬如鲁迅在北京女师大事件中所写的《寡妇主义》等杂文,在崇尚绅士风度的英国人那里就是很难理解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的因素,我在近年来海外汉学的鲁迅研究中隐约感觉到了一种倾向,不少颇有成就的学者力图通过比较、实证的方法,来深入阐释鲁迅创作的文本成就、鲁迅精神结

构与知识结构中的世界性素质,似乎只有还原一个与世界文学广泛联系着的纯粹文学家的鲁迅,鲁迅才是一个能够被世界理解接受的鲁迅,鲁迅研究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研究。

如果这种倾向确实存在,它对鲁迅研究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值得我们予以深切关注的,尤其是在鲁迅研究本身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关于

(下转6版)

## 鲁迅的“世界人”概念和

□王锡荣